

# 《道藏》

## 图像研究

张鲁君

著



齊

天帝黃帝紅龍  
青娥紅臉女

北帝 對死而前  
齊魯成仙聖院

飄經 北國神中  
之案 齊魯神中  
齊魯神中

張魯君

# 《道藏》

## 图像研究

张鲁君 著



北  
帝 對托南帝  
卷五十五 北帝聖元

之案

次與神聖教主夫人  
次與神聖教主夫人  
次與神聖教主夫人

諷經

次與神聖教主夫人  
次與神聖教主夫人  
次與神聖教主夫人

正  
王  
正  
王

齊魯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道藏》图像研究 / 张鲁君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8

ISBN 978-7-5333-3856-5

I . ①道… II . ①张… III . ①道藏—图像—研究  
IV . ① B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7603 号

## 《道藏》图像研究

DAOZANG TUXIANG YANJIU

张鲁君 著

---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3  
字 数 171千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856-5  
定 价 42.00 元



## 导言

### 一、道经图像的造作

图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表达，其出现远早于文字。这里的图像是就广义而言，既包括人类识别的自然图像，如《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更包括人类创造的各种图像符号。在文字产生以前，图像符号是人类唯一的书写语言。随着历史的演进，有的图像逐渐抽象化，慢慢产生出最早的象形文字。文字的出现，标志着图与文开始分道扬镳。从此以后，图与文在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

在中国历史上，“图（圖）”字最早见于金文中，写作“圖”或“圖”，是“囗”（口，边界）和“畺”（畺，即“鄙”，边远乡村）两个字的合体。据近人杨树达所言，“依形求义，图当训地图”<sup>①</sup>。日本学者白川静进一步认为，“圖”本为农庄的地图，其中标出谷仓（“畺”即谷仓）的所在，由此“圖”有了图、地图之义，又生出图画、画图之义。<sup>②</sup>至汉代，“图”字含义已趋复

① 杨树达著：《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页。

② [日]白川静著，苏冰译：《常用字解》，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杂。《尔雅》云：“图，谋也。”又说：“猷，图也。”《说文解字》云：“图，画计难也。从口，从啻。啻，难意也。”再后来图的含义就更多了，兹不赘述。简而言之，“图”字的含义与现代图像一词相关的主要有三种：一是地图。如《周礼·夏官·职方氏》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二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如《庄子·田子方》云：“宋元君将画图。”三是绘画、描绘。如《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杜预注曰：“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sup>①</sup>

古人对象、意和言的关系早有精辟认识。《易·系辞上》有云：“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魏晋著名玄学家王弼在其《周易略例·明象》进一步解释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sup>②</sup>由于图像具有重要功能，它很早就被道教所重视。可以说，自道教创始以来，图像便在弘道宣教的各环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图像始终是道教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譬如在东汉早期道教中，图像便普遍被应用于修炼和传道过程，尽管其形式比较单一，一般表现为绘画。南北朝时受佛教影响，道教造像大行其道，绘画艺术亦有长足进步，图像活动趋于多样化。《隋书·高祖下》载隋文帝杨坚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sup>③</sup>这里所说的“雕铸灵相，图写真行”，便是当时道教肖像图像的两种主要形式。当然，《隋书》所言只是概括，事实上道教图像无论是方法还

① “图”的三种含义据《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③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5~46页。

是内容都远比这丰富。仅就道经而言，道教在实践中发现“立象”无法完全“尽意”，于是对图文相结合而尽其意的方法更为倚重，从而创作出一大批包含插图的道经，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按照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图像概念，道经图像可以分成符和图两大类。据今人解释，符原本是一种权力信物，主要用以调动军队，汉代时巫师方士们模拟符信，而托之于神仙所颁，施之于鬼神世界，认为它们可以召劾鬼神，镇压精怪。<sup>①</sup>其后经过长期发展，道教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符篆。相比抽象难解眼花缭乱的符，图则很容易理解，它广泛见于各种道经中，诸如神仙画像、各种鬼神图、修炼图、炼丹器具图、神芝仙草图，等等。

道经图像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才逐渐走向成熟。早在东汉早期道教出现以前，神仙方士们便造作出许多图像，或单独流行，或作为书的插图，如一些符书、神仙像、修炼图、服食用的草木矿物图等。早期道教势力兴起以后，道经造作迅速增多，以往神仙方士编撰的文献逐渐归入道教范畴，新的道经中图像方法也被进一步继承发扬。至魏晋时期，道教中出现的图像类道经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其大体状况可以通过晋代出现的第一部道藏窥见一斑。郑隐藏书被称为最早的“道藏”，实际上是汉晋道经的一个缩影，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遐览》中对其进行分类时，将这些书籍分为道经和诸符两大类，二者数量竟然大致相当，分别为六百七十卷与五百数十卷。如果将诸符归为图像，再加上道经类中的图经，那么早期道经中以图像为主要内容的道经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还未计算那些含有插图的普通道经。当然，葛洪仅将道书分为道经与符两大类，这种分类法非常粗略。陈国符曾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类：“考其书目，则可分为道经，记，符，图。试为分类，则具服饵，炼养，符图，算律。”<sup>②</sup>当时道经类中的图经主要有《守形图》《坐亡图》《观卧引图》《含景图》《观天图》《木芝图》《菌芝图》《肉芝图》《石芝图》《大魄杂芝图》《东井图》《八史图》等，从名

① 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② 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5页。

称来看其用途不一，既有用于修炼者，又有用于服饵者。

晋代以后的南北朝时期，道经图像得到更大发展。在逐渐成熟的道经分类中，符与图都成了专门的道经分类，并一直延续下去。南北朝时期，撰修《道藏》时逐渐采用了新的道经分类方法，即三洞四辅七部法。由于这种分类法仅从派别着眼，不涉及内容，故后来又在七部之下设立了十二部的次级分类目录。《道教义枢》卷二《十二部义第七》对十二部之义有详细解释：

第一本文者……第二神符者，即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是也。神以不测为义，符以符契为名。谓此灵迹，神用无方，利益众生，信如符契。第三玉诀者……第四灵图者，如舍景五帝之象，图局三一之形，其例是也。图，度也，谓度写玄妙，传流下世。第五谱录者……第六戒律者……第七威仪者……第八方法者……第九众术者……第十记传者……第十一赞颂者……第十二章表者……<sup>①</sup>

从中可以看出，符与图成为撰修《道藏》的两个重要分类。与此同时，其他道经分类方法也大都将符与图单列。如宋明帝时陆修静搜集各地道经，得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关于其内容，唐释明概《决对傅弈废佛僧事并表》云：“爰至宋朝，道士陆修静答宋明帝云：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总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广弘明集》卷十二）甄鸾《笑道论》亦云：“道士所上经目，陆修静目中见有经书药方符图，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广弘明集》卷九）又梁代著名目录学家阮孝绪《七录》将道书分为四部，是为经戒、服饵、房中与符图。北周玄都观在陆修静《三洞经书》的基础上撰有《玄都经目》，《笑道论》对其内容有简要记载：“《玄都经目》云：道经传记符图论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须纸四万五十四张。其一千一百余卷经传符图，其八百八十四卷诸子论，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陆修静录有，其数目及本并未得。”（《广弘明集》卷九）

<sup>①</sup>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册，第 816~817 页。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道经数量非常可观,先后有多次撰修《道藏》的记录。如唐前期尹文操《玉纬经目》共著录道经达七千三百卷。<sup>①</sup>至唐玄宗时期,道经数量进一步增多,唐广成先生杜光庭删《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云:“洎隋火版荡,唐室龙兴,剪扫氛祲,底宁寰宇。至开元之岁,经诀方兴。玄宗著《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sup>②</sup>唐玄宗支持编修的这两部《道藏》达到了唐代整理道书的高峰。安史之乱后,唐人还曾数次撰修道藏,但由于条件限制,规模均较小。进入宋代,由于印刷术的使用,道经的造作与传播有了重大发展,其数量大增。在道教繁荣、道经数量剧增以及使用印刷术的大背景下,唐宋时期道经中的图像内容也有了极大发展,有学者将其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1)符篆之造作渐趋于精细化、复杂化;(2)开始出现将各种图谱、符篆、秘文、印章等汇集于一身的综合著作;(3)随着唐末五代内丹道教的兴起,与内丹修炼有关的符图日益增多起来,并渐成一股潮流,其意乃试图通过有形的图像来传达抽象的丹道之理。<sup>③</sup>

宋代以后,道经图像似乎没有多大进展,直到明正统年间政府支持编修《道藏》,道经图像随同其经本一起经过了一次全面整理,其中既有对以往图像的保存、复原,也有大量新增内容。由于宋元《道藏》早已失传,明前其他道经刻本几无所存,宋前抄本更是不可睹见,因此古代道经图像主要就集中在明《道藏》中,它是我们今天进行相关研究的主要资料库。

## 二、《道藏》图像概述

明正统十年(1445)修成《道藏经》,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五卷。又万历三十五年(1607)修成《续道藏经》,增书三十二函一百八十卷。《道藏经》和《续道藏经》即今之所谓明《道藏》(有时亦以《正统道藏》统称

① 《道藏》,第34册,第516页。

② 《道藏》,第9册,第346页。

③ 朱越利主编:《道藏说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之)。《道藏》延续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经分类方法，其十二类的名称分别为本文类、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谱录类、诫律类、威仪类、方法类、众术类、记传类、赞颂类、章表类。其中神符与灵图两类收录了大量相关道经，神符类道书且不论，仅后者就有洞真部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旁通图》《修真太极混元图》《修真太极混元指玄图》《金液还丹印证图》《修真历验钞图》《龙虎手鉴图》《上清太玄九阳图》《三才定位图》《上清洞真九宫紫房图》《周易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易数钩隐图》《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易象图说》《玄元十子图》；洞玄部的《上清八道秘言图》《上清含象剑鉴图》《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七域修真证品图》《玄览人鸟山经图》《太上玉晨郁仪结璘奔日月图》《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上方大洞真元阴阳陟降图书后解》《上方大洞真元图书继说终篇》《许太史真君图传》《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洞神部的《上清金阙帝君五斗三一图诀》《四气摄生图》《太上通灵八史圣文真形图》《图经衍义本草》等。至于其他带有插图的普通道经就不胜枚举了。

由上可见，《道藏》中收录的符图类道书数量非常多。不过，由于其分类方法的局限性，神符和灵图两大类既不能囊括道教全部图像内容，其自身收录的道经也比较驳杂，分类不清晰。具体而言，对道经图像研究来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神符与灵图两分类下所收道经内容驳杂不一，很多内容彼此相去甚远，灵图类尤其如此，如道教谱系图、修炼图、易图甚至纯粹的本草著作均列在一起。

第二，一些道经虽然列入灵图类，但其性质实际上并非单纯的图像著作，如《图经衍义本草》就是带插图的医家本草经。

第三，仅有神符类和灵图类两种分类忽略了其他包含插图的大量普通道经，而这些插图并非可有可无，有的是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研究道经图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如《太平经》有插图多幅，其中的卷九十九至一百一即分别为《乘云驾龙图》《东壁图》与《西壁图》，图及

其内容本身即为《太平经》要表达的重要思想。

仅仅以上几个问题的存在，就对研究《道藏》中的图像内容造成了很大困难。换句话说，依据《道藏》的分类方法，既难以看清各类不同内容的符图道经，更无法顾及散见于其他道经中的插图（包括符箓及图）。实际上，在研究道教过程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传统道经分类方法的局限问题。有鉴于此，近代以来学者们曾先后尝试过多种新的道经分类方法。譬如陈撷宁先生的《道藏书目分类》根据书的性质列出十四大类，戴遂良（L.Wieger）的《道藏引得》则分为五十六类，钟肇鹏的《道藏目录新编刍议》分为六类二十二目。以上三种分类方法大多基于道教自身的传统。朱越利的《道藏分类解题》则根据现代学科分类将道书分为十五部三十三类。以上提到的这些分类方法虽然并非专门针对道教图像，但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要研究《道藏》中的图像内容，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分类标准，建立适合研究目的的新分类，进而再确定本书要对哪些图像进行研究。在这之前，我们先根据图像内容，对《道藏》所收录图像的整体情况（除神符类和灵图类中相关符图道书外，还包括散见于《道藏》其他各处的所有插图等）作扼要介绍。

《道藏》中的图像非常丰富，数量庞大，内容包罗万象。根据其内容归类，图像数量较多的大致有符箓、神仙、道术、器具、药物、易图等几种，我们一一来看。

如果将所有符箓都视为图像的话，其数量无疑最多，在《道藏》各部中分布也最广，像洞真部本文类、神符类、灵图类、方法类，洞玄部本文类、威仪类、方法类、众术类，洞神部本文类、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方法类、威仪类、戒律类、众术类及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等都有大量道符。若根据其各自功能，这些符又分为多种多样。由于数量较多，这里不作详细介绍。符箓在道教中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多，详见下文学术史回顾。

神仙图像本书指的是道教诸神仙，这一类数量也很大，涉及的道教神仙非常之多，譬如，《三才定位图》绘三清天诸神像列位图；《金莲正

宗仙源像传》绘老子、全真五祖及七真像；元赵孟頫作《玄元十子图》，绘关尹子、文子、庚桑子、南荣子、尹文子、士成子、崔瞿子、柏矩子、列子、庄子十像；《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中的大洞帝尊示现之图，等等。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神仙图像，即某位神仙的连环画集，如《许太史真君图传》以图传的形式记载了许逊降生、修道、访师、炼丹、斩蛟、隐居、飞升等事迹，共五十二幅图像并十二真君像各一幅；《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系桐柏真人王子晋得道的十一幅连环画以及图解和赞词。这一大类图像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内容，关于其分类理路与方法详见本章后文，这里从略。

道术图像指道教中各种修炼方术的图例。道教中的方术如存思、内丹、炼气、导引术等在《道藏》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图例，如《上清大洞真经》的“诵经入室存思之图”、《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旁通图》《修真太极混元图》《修真太极混元指玄图》《金液还丹印证图》《存神炼气铭》《上乘修真三要》《太上玉晨郁仪结璘奔日月图》《玄圃山灵籙秘策》中的“炼形图”、《太上老君大存思图注诀》等。这类图中还有一些与医学有关的，特别是反映身体内部器官与构造的图像，如《仙传外科秘方》中的“发背形正品”“莲子发”等，《高上月宫太阴元君孝道仙王灵宝净明黄素书》中的人体器官、结构图等。此外，《太上除三尸九虫保生经》中还绘有各种人体寄生虫图像，这实际也与神仙修炼有关。由于道术类图像大多都系人物图，故也是本书的讨论内容，其详细的分类理论与方法同见本章后文。

器具图像指外丹黄白术及道教法器图。外丹黄白术器具图如坛、灶、各类鼎等，集中分布在一些外丹黄白经中，如《黄帝九鼎神丹经决》《感气十六转金丹》《修炼大丹要旨》《金华冲碧丹经秘旨》《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等。一些内丹经如《金液还丹印证图》中也有炼丹器具图。此外，像《上清含象剑鉴图》中的道教镜与剑图、《上清长生宝鉴图》中的道教镜图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道教法器图像。

药物类图像包括道经典籍与医药典籍中的药物插图，前者如《白云仙

人灵草歌》中的五十四种草药图、《太上灵宝芝草品》中的一百二十七种芝图等；后者如《图经衍义本草》中的大量插图等。这些图像是研究道教药理学知识及古代本草学、矿物学、植物学的重要资料。

易学图像也很丰富,如《周易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易数钩隐图》《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易图通变》等易图典籍,以及《抱一函三秘诀》中“伏羲先天始画之图”和“文王后天八卦之图”等,《周易参同契发挥》中的“四象图”和“五行生成图”等,《玄宗直指万法同归》的“太极图”和“无极图”等、《太古集》之“乾象图”“坤象图”“日象图”“月象图”等。

除去以上经书数量较多的几类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图像,譬如《通占大象历星经》《天原发微》中的星图,《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经法》中的二十八星宿图,《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中的五岳地形图,<sup>①</sup>《雨暘气候亲机》中的天气图,道教仪式图,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 三、道教图像研究综述

20世纪初,西方艺术史研究学者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首先使用了“图像学”这一词汇,他与其后的一批学者如潘诺夫斯基(E.Panofsky)、扎克斯尔(F.Saxl)、维特科夫尔(R.Wiittkower)和温德(E.Wind)等对图像学的性质重新作了设定,把它理解为一门以历史——解释学为基础进行论证的科学,其研究重点在于对图像进行全面的文化与科学解释。<sup>②</sup>这种研究转向日渐形成一种用多学科方法来研究图像的局面,对于各相关领域如艺术史、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惠于图像学的繁荣,海外道教研究者们最先对道教图像的重要性给予重视,先后围绕道符、道教肖像与绘画艺术、道教法器等专题撰写

<sup>①</sup> 关于五岳真形图与地图学关系的最近研究参见姜生《东岳真形图的地图学研究》,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sup>②</sup> [英]E.H.贡布里希著,杨思梁等编选:《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编者序》,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

了大量研究论著，以下对相关成果作扼要介绍。<sup>①</sup>

道符是道教文化中比较独特的现象，其神秘性及宗教内涵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出现多种研究成果。如莱热萨(Legeza Laszlo)的《道法——图形和书法的秘密语言》(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5)对《道藏》中的符字、符文、符图等作了概括说明。汪德迈(Vandermeersch Léon)的《王道》(*Publications de l'EFEO*, Paris 113, 2 vols, 1980)认为书写语言由精于占卜的人加以发展，用来记录有关鬼神的仪式活动，有时甚至完全是写给鬼神看的。贺碧来(Robinet Isabelle)《道教的存思》(Paris: Dervy-Livres, 1979)、劳格文(Lagerwey John)《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New York: MacMillan, 1987)等对于道符的研究揭示了符作为现实基础的不可见力量，并允许人对其进行操纵。

当然，道符种类非常多，有一些比较特殊，五岳真形图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日本的菊丘文坡、横山润、平田笃胤等人很早就讨论过五岳真形图的思想内涵。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泰山——有关一种中国崇拜的专题论文》对泰山做了全面研究，并探讨了《五岳真形图》(Paris: Annales de Musée Guimet 28, pp. 415-24, 1910)。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的《五岳真形图的信仰》(见吉冈义丰、Michel Soyamié编修《道教研究》，第2册，东京：昭森社1967年版，第114~162页)探讨了真形图的宗教意义。以上研究主要着眼于真形图的思想性，都没有注意到其地图特征。20世纪初，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发表《中国地图学之发达》一文，首次提出五岳真形图是一种古代地图，这种观点后来得到学者的广泛接受，并出现很多更为深入的研究，如井上以智为的《五岳真形图考》对五岳真形图的版本、年代及其演变情况作了详细分析。李

---

<sup>①</sup> 以下介绍参考了法国学者索安著(Anna Seidel)《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吕鹏志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陈颖飞《近二十年海外道教研究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期)、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8期)等资料。

约瑟 (Needham Joseph) 对真形图的科学价值评价很高, 认为真形图是绘制等高线地图的早期尝试, 其技法较之现代形式也不逊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46, 1959) 鲍菊隐 (Boltz Judith M.) 《〈道藏〉中的制图法》一文讨论了《道藏》中的制图技术, 分析了五岳迷宫图和天界、阴间图, 画于九宫魔方中且以九为布局单位的空间图、星图, 祭坛与祈祷室的平面图等。

道教肖像与造像方面, 薛爱华 (Schafer Edward H.) 的《唐代的皇家肖像》(*Sinologica* 7:156-60, 1963) 提到唐代受皇家对老子崇拜的影响, 出现为活着的皇帝造像的情况, 使道教肖像数量激增。本 (Benn Charles) 《玄宗皇帝道教思想的宗教性》(D. Chappell, ed.,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Asian Studies at Hawaii 3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127-45, 1987) 一文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研究。日本学者对六朝时期道教造像进行了不少研究, 如神冢淑子《南北朝時代の道教造像——宗教思想史的考察を中心に》(1993年初刊, 收入《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 创文社1999年); Yoshiko Kamitsuka, “Lao-tzu in Six Dynasties Taoist Sculpture” (《六朝道教造像中的老子》, in 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 Fargue ed.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Stanley Abe, “Heterological Visions: Northern Wei Daoist Sculpture from Shanxi Province” (《陕西省的北魏道教造像》, *Cahiers d’Extreme-Asie*, 9, 1997)、柏夷 “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of 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从姚伯多碑看早期灵宝经的道佛混合》, *Cahiers d’Extreme-Asie*, p.9, 1997) 等。

道教与绘画艺术方面, 西尔伯杰尔德 (Silbergeld Jerome) 《西方的中国画研究——一篇关于学术状况的研究》一文 (*Journal of Asican Studies*, 46:849-97, 1987) 介绍了佛教和道教图像。汤普森 (Thompson Laurence G.) 的《道教肖像》(*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III, Mircea Ekuadem ed., New York, MacMillan, pp.50-4, 1987) 讨论了道教肖像的象

征和功能。道教壁画、绘画等方面,怀履光(White William Charles)的《中国庙宇壁画——三世纪的三幅壁画研究》(Toronto, 1940)对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三幅元代道教壁画进行了研究,开启了中国道教壁画研究的先河。其他如梅尼尔(Mesnil Evelyne)的《蜀王国(公元891—965年)的宗教绘画——〈益州名画录〉研究》(Ph.D. diss., University of Paris)对《益州名画》、考尔巴克(Kaulbach Barbara)的《对道教画卷的解释》和《当今台湾宗教实践中的地狱画像》(in J. Ebert, B. Kaulbach, M. Kraatz, eds., *Religiöse Malerei aus Taiwan*, 1980)、芬丝黛布氏(Finsterbusch Käte)的《汉画像目录和主题索引》(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ol. 1, 1966 and Vol. 2, 1971)、鲁惟一(Loewe Michael)的《通向天堂的道路——中国人对不死的探求》(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9)、论文集《道教与中国艺术》(*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等涉及对道教绘画的研究。另外巫鸿《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成分(公元二和三世纪)》一文(*Artibus Asiae* 47.3-4: 263-352, 1986)讨论了公元3世纪孔望山岩雕中的道教信仰内容。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关于道教肖像、绘画等的研究已经不少,尽管如此,这一领域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东西实际上更多,很多方面还没有涉及,如薛爱华在《太玄玉女》(*History of Religions* 17: 387-98, 1978)中提到,道教肖像研究就完全没有注意对神祇外貌、衣着、头饰、颜色、标志、扈从等方面的研究。索安更认为“道教肖像是一个丰富而几乎完全未被触及的研究领域。……什么是肖像的仪式功能、文本基础、道教阐释?至今尚无人对这一领域做出合适的调查,尽管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博物馆藏有自六朝和唐代以来的一百多件刻有文字的道教雕像,而且,毫无疑问更多的雕像还在其原来的位置——特别是在陕西南部”<sup>①</sup>。

除以上几个方面,与道教图像有关的研究还有很多,如石泰安(Stein

<sup>①</sup> [法]索安著,吕鹏志等译:《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8~70页。

Rolf A.) 的系列文章《远东的建筑和宗教思想》(Arts Asiatiques 4: 163-86, 1957)、《宇宙的各种象征和宗教建筑》(Exhibition catalogue. Paris: Musée Guimet, vol. 1 tex and vol.2 illustrations, 1957)、《缩微世界——远东宗教思想中的容器花园和住宅》(Stanford: 1990) 等讨论了道教建筑的宗教意义; 薛爱华(Schafer Edward H.)《唐代道士的一面镜子》(*Early China* 4 (1978-79): 56-9)、卡希尔(Cahill Suzanne E.)《铜铸字——中古中国的铜镜铭文》(*Archives of Asian Art* 39, 1986) 等涉及铜镜与道教。

与国外学术界相比, 国内学术界对道教图像的研究不仅起步晚, 而且长期以来研究范围与深度都不及国外。改革开放以前,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 相关研究才逐渐多起来, 但主要偏重于在道符、章表符印法器等、造像石刻、道教与艺术等几个方面。

道符、章表符印法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 如姜生《道符结构、语义及功能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 李远国《论道教符的分类》(《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2期) 与《论道符的结构与笔法》(《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 孙以刚《江南道教胜地三清山出土道家古印》(《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冯广宏与王家佑《什邡巴蜀印文考义》(《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 刘晓明《三清山古印考》(《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1996)《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第六卷) 与《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任宗权《道教手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与《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巴蜀书社2004年) 等。

道教造像石刻研究如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以及《陕西北魏道(佛)教造像碑、石类型和形象造型探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李淞《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中国道教》1994年第3期) 与《临潼六通北朝造像碑考释》(《中国道教》1996年第2期)、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等。



道教与艺术研究如丁若木《道教与中国画略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1996）、丁培仁《从黄公望〈写山水诀〉看道教的悟性思维方式》（《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张松辉《道家道教与司空图》（《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王霖《唐代寺观壁画札记》（《新美术》1999年第3期）、高明《陕西耀县药王山南庵道教壁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等。

关于道教图像还有一些其他专题的研究，如詹石窗《论道教神仙形象与易学符号之关系》（《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1期），特别是近几年出版的道教考古著作，里面有大量与道教图像有关的内容，如张勋燎与白彬合著的《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刘昭瑞的《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王家佑的《道教考古文集》（成都民族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2007年）等。

此外，自本书雏形撰写的2008至2009年以来，无论国内外艺术史界还是道教研究界，道教图像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研究明显增多，略举几种，如胡知凡《形神俱妙——道教造像艺术探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汪小洋、李彧、张婷婷《中国道教造像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淞《道教美术新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中国道教美术史（第一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神圣画像：李淞中国美术史文集》（人民出版社2016年），黄土珊《绘真形：中国古代道教视觉艺术》（Shih-shan Susan Huang,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12），尹翠琪“*Daoist Image and Its Efficacy: The Frontispieces to the Wanli Emperor's Yushu jing*”（*Artibus Asiae*, Vol. 75, No. 1, 2015）、《〈正统道藏〉本〈三才定位图〉研究》（《“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3卷2012年），等等。